

★ POWER, PROFIT, & PRESTIGE ★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美国为何将中国视若强敌？
极度扩张如何动摇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动摇的 霸权

美帝国的扩张史

[法] 菲利普·戈卢布 (PHILIP S. GOLUB) / 著
廉晓红 王璞 /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 POWER, PROFIT, & PRESTIGE ★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动摇的霸权

美帝国的扩张史

[法] 菲利普·戈卢布 (PHILIP S. GOLUB) / 著

廉晓红 王璞 /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摇的霸权:美帝国的扩张史/(法)戈卢布
(Golub, P. S.) 著;廉晓红,王璞译.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 7

书名原文: Power profit & prestige: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ISBN 978-7-5162-0554-9

I. ①动… II. ①戈… ②廉… ③王… III. ①霸权主义—研究—美国 IV. ①D7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2099 号

Copyright © Philip S. Golub 2010. Power, Profit and Prestige: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first published by Pluto Press,
London www.plutobooks.com.

图书出品人:肖启明

出版统筹:刘海涛

图书策划:何奎松

责任编辑:刘姝宏



书 名/动摇的霸权:美帝国的扩张史

Power, Profit & Prestige: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作 者/[法]菲利普·戈卢布 著

廉晓红 王璞 译

出 版·发 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100069)

电 话/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63055259

<http://www.npepub.com>

E-mail: mzfx@npe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 开 710 毫米×1000 毫米

印 张/16.75 字数/288 千字

版 本/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 字:01-2013-8628

书 号/ISBN 978-7-5162-0554-9

定 价/39.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献给利昂·戈卢布(Leon Golub)和南希·斯佩罗(Nancy Spero)

序 言

PREFACE

20 年前，在苏联突然解体之后，美国相当意外地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成了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那些不断争夺国际帝国地位和欧洲大陆垄断地位的现代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在战略、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经济层面，都没有可以匹敌的挑战者。随着冷战后的变革逐步呈现，美国在这些层面的优势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不平衡日益加深，使美国对国际安全事务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控制能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使美国成为全球通讯网络的中心，这个网络将美国的生存和行为方式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日本和欧洲分别经历过漫长的停滞和发展缓慢时期，而美国与它们相反，其强劲的增长势头似乎可以保证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大多数“南方国家”都被迫归顺于“华盛顿共识”所规定的新的依赖性网络；中国仍然在进行经济改革，正逐渐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并认同它的制度约束。

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似乎历史性地成为世界权力和权威的独一无二的中心。它设定了全球议程，确定了管理国际体系的框架和“政治制度”，并确保世界政治的各个问题领域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发展，只不过这样的格局会持续多久还不能确定，但是许多美国评论家将冷战的结束解读为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上升周期的终极成果，因此既有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对

于他们来说，“单极时代”标志着一个持续的美国全球霸权时代的开始。那些抱右翼政治态度的人尤其信奉这样的观点，而美国“政治精英”中的某些信仰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间派也同意这个观点（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 2001 年一次具有标志意义的声明中写道：“在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美国拥有着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都无法匹敌的优势地位。从武器装备到创业精神，从高等教育到大众文化，美国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高超实力。”他和众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一样，认为“美国的优势地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即使是以前持衰落论调的人，比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都认为冷战后的层级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是完全按照当时提出这些观点的历史情况得出的结论，而没有考虑到可能的变化。

现在我们知道，冷战的结束以及同时发生的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所带来的结果是比较复杂的。过去十年，我们目睹了权力的分散以及美国的权威在日益多元和多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逐渐侵蚀。虽然这种离心的趋势是很多国内和国际因素导致的，但是这里要着重提到一些核心的因素。

首先，两极局面的结束带来大好机会来修复和强化构成国际合作基础的多边制度结构，扩展国际法的范围和使国际关系去军事化，但是美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和 1945 年的情况类似，这样的历史时刻需要在全球层面开始一次新的“大谈判”，建立更具有包容性和民主性的世界政治模式。这个机会的错过反映了美国国内社会结构的中心（“军事工业集团”）和美国的权力精英对于我所说的“帝国主义宇宙观”的固执。

其次，和刚才说的一样，美国选择了扩展它的实力和巩固它的“优势”地位，把摊子铺得太大。在经济层面，美国挑战其他发展模式，咄咄逼人地推行全球自由化和确保美国的优势，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使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做出保护性反应，它们对帝国的消极抵抗成了当时的一个基本历史特征。在 1997 年到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理不当也是它在经济领域的一大败笔。在战略层面，很多人都认为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建立一个在美国唯一控制下的以惩戒为主的世界秩序而进行的一次非法行动。美国在 21 世纪之初开展的战争破坏了美国的权威。而且，这些战争的结果证明了“硬实力”在后殖民全球化条件下的局限性。这些政策选择的本意是阻止离心化，结果适得其反。

最后，也是更根本的因素，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最近几十年，东西方之间的平衡逐渐地，但是从历史上看又是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程度直到最近才比较明显，而当前主要影响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又给这种变化加了一把火。20 世纪 70 年代，“南方国家”在全球产出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微乎其微，但是现在“南方国家”已经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三分之一以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世界制造业价值增加中占 30%，在世界贸易中占 40% 左右，并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务盈余。与此同时，“南方国家”之间的区域性经济联系和跨洲经济联系也不断增加，改变了世界贸易和投资流向的格局。南南贸易从非常低的层次起步，在过去 20 年间的扩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整个世界的贸易增长速度，现在已经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5%，占世界制造业出口额的 21%，占中高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的四分之一。亚洲是全球产品和资金流向改变的中心，占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和南南贸易流动的 80%。中国在过去 30 年的复兴当然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主角。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最近的报告已经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系统性变化的历史重要性。世界银行在报告中写道：“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经济实力的范式始终随着最能够推动全球增长的国家的起伏而变化……在第二个千年的前半部分，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增长极点。工业革命让西方的欧洲国家赶了上来。而在二战之后，美国成了全球经济中最重要力量……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开始了一次新的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层级产生重要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2013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同样强调：“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划时代的全球变革。南方国家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其他国家生活在欧洲和北美阴影下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从工业革命就开始了，经过了殖民时期，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现在，又一次结构变化将发展中国家带入了上升的轨道。”

因此，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单极时代”其实是欧洲和大西洋地区长期统治地位的终结，而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共同主导的开启新时代的开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和新力量的“崛起”：美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科学和技术领先者，其经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以上，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仍然是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是这意味着，在平衡已经改变的不存在主要引力中心的新世界体系中，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多中心主义不一定会带来无序或冲突。但是从一种体系过渡到另一种体

系，肯定会在相互依赖也因此而分散的世界体系中，给未来全球政治组织带来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再独自设置全球议程，不再像现在这样，似乎被认可为全球的领导，那么欧盟显然更加缺乏领导力和权威。欧盟陷入一场结果还非常不明朗的经济危机之中，国家权威与联盟权威之间的矛盾此起彼伏，使得它只能是世界舞台上一个没什么力量的参与者。“南方国家”中那些新兴的或复兴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它们都面临着重要的国内发展问题，而且，虽然它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仍然还很模糊。1945 年以后建立的国际机构既没有有效解决当前全球问题的权威，也缺乏相应的手段。由于权威的分散，所以没办法集体行动，这说明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一个以遵守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一个全新的全球制度结构，在此基础上开展未来的国际合作。

菲利普·戈卢布
国际关系学教授
巴黎美国大学
2013 年 8 月 25 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引 言 / 001

扩张主义行为 / 004

一种历史社会学方法 / 007

理论上的美帝国 / 011

不确定的未来 / 015

本书的结构 / 017

第二章 世界历史背景中的美帝国 / 021

多元和多中心的世界经济 / 023

西方全球扩张行为的特殊性 / 028

全球化与战争 / 031

跨大西洋帝国主义系统中的美国 / 034

第三章 从林中血的味道:19 世纪末 / 043

美国:一个“活跃的单位” / 046

海外帝国主义 / 048

帝国之间的联系与竞争 / 056

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和超级帝国主义 / 060

第四章 美式和平中的层级 / 065

取代英国 / 067

三国鼎立的帝国系统 / 069

欧洲:霸权主义的前沿 / 071

专制的重商主义:东亚前沿 / 076

训练遥远的帝国 / 080

第五章 “冷战”后的权力和财富 / 083

美国的军事统治权 / 085

避免走下坡路 / 088

角色设计和结构性限制 / 091

“冷战”后的选择 / 096

自由的幕间休息 / 101

克林顿:经济至上 / 102

第六章 争取全球垄断 / 107

广泛的观念趋势 / 109

全球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 / 111

无限的目标 / 118

自由帝国主义,殖民代表 / 123

第七章 失 控 / 129

战争和全球化 / 131

美国权力危机 / 134

离心趋势日益明显 / 137

中国的新角色 / 142

挑战美国主导地位 / 146

第八章 结论:秩序、层级和多元主义 / 147

帝国主义的宇宙观 / 149

世界权力的逻辑 / 151

变革的路径 / 154

长期退出帝国舞台 / 155

多元主义者的合作 / 157

注 释 / 160

精选参考文献 / 214

索 引 / 242

缩写对照表 / 252

致 谢 / 254

第一章 引言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将 20 世纪末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定义为创造无国界的、整合的、相互依赖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那么这种全球化格局已经开始动摇……今天，在新的、更开明的政治领导下，美国似乎已经准备好与其他国家协商建立更富有包容性的世界秩序，缓解冲突，至少放弃部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承诺，并接受各国相互依赖和多极化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菲利普·戈卢布 (Philip S. Colub)

美国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不断谋求垄断。我们对这样的行为困惑不已，所以从几年前开始对美国的扩张主义进行历史社会研究。美国的扩张主义完全成形之时，正值其金融系统崩溃，而全球又面临着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美国国内和国际的管制部门采取了规模空前的反周期干预手段，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设法避免了经济大崩盘，但是这次的危机确实使世界经济产出、国际贸易额和跨国资本流动大幅下滑。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萎缩，使全球需求紧缩，进而影响了只依赖少数几种商品或工业品出口来维持增长的“新兴”国家。很多小型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非常依赖与主导市场的关系，因此徘徊在破产的边缘。世界各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也急剧增加，出现了国际劳工组织所谓的“全球就业危机”。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层面来看，这次的局面肯定不如 20 世纪 30 年代那么可怕。但是，由于没有一个能得到普遍认可的权威，或经过授权的全球性管理机构，而社会公众越来越迫切地希望免受世界市场风暴的影响，感觉像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各国管理者肯定会在经济上各自为政。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会持续多久，现在下断言还为时过早。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将 20 世纪末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定义为创造无国界的、整合的、相互依赖的世界

资本主义经济，那么这种全球化格局已经开始动摇。

这次的危机牵涉范围广泛，标志着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出现的经济国际化进程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这意味着美国的挫败。小布什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失败，以及它一步步破坏了 1944 年到 1945 年间建立的国际法律和政治秩序行为，损害了美国的政治合法性。这之后，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崩溃给全世界都带来了损害，从而严重侵蚀了美国对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诉求。现在和 20 世纪 90 年代不同，美国不再具有制定经济行为的规则和框架的地位，更不用说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的整体利益一致了。当前世界性危机的方方面面都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美国的权力政治目标与资本的去领土化逻辑不总是一致的，而是像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那样，二者是以“复杂有时相互矛盾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1]。然而，在 20 世纪末，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多边机构和美国的愿景及利益相一致，才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它们要打破阻止资本自由流动的最后障碍（现在已经无效的“华盛顿共识”），建立一种霸权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模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跨国资本要想渗透到更多地区，就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和权威来扫清残余的制度限制，消除那些阻碍世界市场扩张的政策。美国金融行业的准则就是赚取最大利润，成为一众国际和跨国机构的领头羊。这些国际和跨国机构被拽到美国这个核心周围，形成了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说的非正式的美帝国的天然拥趸，把美国视为其权威的来源和利益的保障者^[2]。而在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于 1998 年预测的这次“不可阻挡的市场资本主义大潮中”^[3]，美国收获的是政治利益。因为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资本的流动会使美国具有更强的能力来影响世界各国的行为，获得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更有利的结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领导者“认为可以任意使用这种不受约束的力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让尽可能多的国家接受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从而使美国有机会影响国际环境，提高美国的地位，并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利益”^[4]。美国与它在其中占据主导话语权的跨国机构和世界经济论坛等私人跨国俱乐部一道，制定全球议程，并在促进全球自由化、设定全球化的框架及推行全球化规则的过程中发挥了明确的政治作用。所以，用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话说，美国发现自己在“冷战”后处在

“一个复杂但是一致的权力星座”的中心^[5]，美国的军事力量支撑着这个中心地位，它还用高压手段来保障有利于资本扩张的全球环境，并推行美国的政治权威。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权力差异和主权差异，随着各国参与全球劳动部门的性质不同，以及相对的政治自主权的不同，全球自由化对各国的影响也是不对等的。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生都能够分析出^[6]，相对较弱的周边国家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会被拉到最发达的国家周围，无力抵抗，只能服从少数几个主导国家的政治选择。世界市场的力量会使这些力量较弱的国家的经济正常发展，而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系统则会受到各种它们无法控制的决策的质疑。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东北亚国家，在“冷战”中依靠美国的支持脱离了“第三世界”，也仍然面临着持续的严峻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珊·斯特兰奇就指出，“所有关于市场参与者和中介的决策权，过去基本完全属于每个国家政府的特权，而现在却被少数几个最大、最富有的国家不公平地占有着，而美国在其中的重要性又远远超过其他国家”^[7]。十年后，在全球自由化的大潮中，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单边特权变得更加明显。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准确地提出，资本的流动性和自由化“将美国政府从限制中解放了出来，却使其他国家被限制得更紧”^[8]。实际上，这个规则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一些政治上自主的“新兴”国家还没有陷入被约束和控制的大网，比如中国，由于实行渐进式的、有所控制的国际化过程和实行资本控制，所以能够利用资本流动实现内生发展的目的^[9]。但是对大多数其他国家来说，全球自由化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工具，按自己的喜好行事，并将其他国家的政治选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扩张主义行为

历任美国政府，尤其是克林顿政府，所追求的全球经济自由化议程和布什政府所一意追求的权力型政治议程，分别代表着扩张主义者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前者以采用和平但强制性的手段来追求经济优势。全球自由化

用相互依赖和集中化这些论调来掩盖其实现霸权的目的，它需要一些国际认同，至少需要精英层面的认同，还要维持和建设一些相互重叠的国际和跨国的公共及私人机构，为实施全球自由化提供一个框架。而后者则采用更明显的掠夺性和不光彩的手段，利用 1991 年后军事力量极端不平衡的局面，建立一个只有美国能够控制的世界秩序。这两种不同的行使权力的方式，反映了不同的精英群体的不同选择：一方是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系统的利益相关者的国际化群体（按照传统的政治分析分类，他们属于“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另一方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主权主义者”），他们与军事工业和国家安全部门血脉相连。军事扩张主义者赤裸裸地追求垄断，相比较之下，就使得全球自由化变得非常有吸引力。对垄断的追求需要“打破 1945 年建立起的主要合作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给传统的国际冲突丛林带来一些秩序和缓和”^[10]。如果不打破合作、废弃国际法，追求垄断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就曾在 2000 年的大选中把国际法贬低为“国际行为的虚幻规范”^[11]。换句话说，在存在巨大的、越来越明显的不平等的情况下，国际主义者的经济新自由主义议程维持了平等和多样性的虚幻假象，而极端民族主义者却在过度保障美国的主导地位，“无耻地制定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准备推行这些规则”^[12]。

这两种扩张形式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强迫性和侵入式的，会影响国家的自主权，使承受这种强迫举动的社会对原来的社会结构产生质疑。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种扩张形式都是“帝国主义式的”（下文将给出其定义），它们的前提假设都是：美国有能力和权利将世界重塑成它想象的样子，扮演国际系统的中心，并保障或强制实行它的特权。无论是自由的国际主义者还是在 1991 年后开始掌舵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把“冷战”的结束视为和美国在“二战”后开始“推行全球主义”一样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胜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冷战”后的世界局势设想成锁定经济优势或扩大美国势力范围的历史性机遇。卡尔（E. H. Carr）曾非常准确地评价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 20 世纪末的世界观，说二者都具有“站在世界之巅的视野”^[13]。实际上，就像我将在第六章说明的那样，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所有主要权力精英的发言人，以及某些闲聊的人，都经常把美国比作

“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亨利·基辛格），有强大的影响力，并开始梦想一个全新的“美国世纪”，打造崭新的、范围更广大的“美国和平”。在政治上持右翼观点的人和国家安全部门中，这种理想中的趋势尤其明显。不过，虽然存在这样的差异，对于如何保证美国的权威，尤其是如何在强制与说服之间保持平衡，以及如何发挥国际机构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美国所有的主流精英意见仍然是要巩固和延伸美国在“冷战”后的“无上地位”。换句话说，两种扩张形式其实是对同一种帝国社会精神的不同表达而已。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通过不同渠道开展的扩张行动，使美国的权力和权威遭遇了现在的危机。

现在，美国的掌控力已经减弱了，20世纪末全球化背后的“权力星座”的凝聚力和权威也减弱了。小布什政府挑起战争的行动导致了近乎全球性的政治对抗，世界上其他国家准确地认识到，美国的军事扩张是试图限制多样性，建立一个在单一世界权威控制下的新世界秩序。同时，由于美国背弃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也让人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形象提出了质疑。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美国似乎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的专制的军事巨人。现在，以美国为核心的跨国金融行业通过一种不同的掠夺行为，已经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系统性崩溃和全球性混乱，削弱了它的权力和权威赖以支撑的基础。其后果是，这种崩溃使人们开始质疑美国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维度——它是否有能力制定全球化议程和定义世界经济管制的框架。当然，美国仍然拥有“过分的特权”，能够用本国的货币为自己的债务埋单，因为美元仍然是世界上基本的储备货币，但是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依赖顺差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决策来应付其庞大的赤字。即使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安然渡过了风暴，甚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它也已经不能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仅靠单边决策就可以改变世界经济运行的状态，通过美元将调整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而不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因此，用《金融时报》的话说，军事扩张主义导致的混乱已经达到了顶峰，“西方金融系统的崩溃标志着‘单极时代’被耻辱地终结了”^[14]。